



女人与房间

□梅莉

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散文集——《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》出版于1929年,是由她的演讲稿编写而成。1928年,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作过两场演讲,主题是“女性和小说”。她却因生为女人,被拒绝单独进入图书馆,还被从草坪上赶了出来。毫无疑问,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地位是卑微而低下的,哪怕是才女伍尔夫。

读后感依旧感慨万千,我要是在年纪轻轻时看过此书就好了,这样会早早领悟到金钱的重要性,而不是人到中年才幡然醒悟要努力赚钱、存钱。老公曾各种惋惜,你怎么不再是当初那个没有物欲、人淡如菊的温婉女人,而变成一个财迷了呢。我坚定地回答,不,我觉得年轻时漠视金钱的自己简直太傻了,现实让人清醒,如果没有钱,我连妈妈的保姆费都付不起。

文艺女性都有清高的一面,仿佛谈钱爱钱就降低了人格,有的作者甚至发表了文章没收到稿费都不好意去要。虽然我一直不赞成女性做全职太太,伸手向男性要钱,势必失去精神上的独立,但我并没有努力赚钱的欲望,而是躺在工作的舒适圈,觉得养活自己就很好了,赚钱的事交给男人吧。一百年前伍尔夫的精神世界已遥遥领先于我,她一针见血地道出女性的种种困境均来源于贫穷。她真诚地劝告女同胞:“我希望,大家无论通过什么方法,都能挣到足够的钱,去旅行,去闲着,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,去看书做梦,去街角闲逛,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。”如今的都市女性实现这些并不难,而在一些偏远的地方,可能这还是奢望。近年来因为自媒体短视频的盛行,很多女性也开始觉醒。比如六十岁的苏敏阿姨离家出走后,通过自驾游拍视频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价值,摆脱了糟糕的婚姻。首先是她经济上不再依赖于丈夫,才有享受看世界的自由。也有在大冰演播室里说“种完麦子,我就往南走,到西双版纳,过个冬天”的麦子阿姨,她在爱心人士的接力下,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

在伍尔夫所处的男权时代,女性实在太贫穷了:“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,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与动荡……”还是女人心疼女人呐。女人想写小说,写诗,必然要遭到嘲笑与打压,她们的正业是生孩子与做女红。那时的女性进行文艺创作,只能遮遮掩掩,生怕被人发觉,因为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。

所以伍尔夫明确地表示,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,她必须得拥有两样东西,一样是金钱,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。有钱不难,钱多钱少而已,但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谈何容易,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。看过某位知名女作家的散文集,她在书中坦言迄今为止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。而在伦敦某出版社工作了一辈子的著名编辑戴安娜·阿西尔,在其作品《暮色将尽》里也说自己买不起伦敦的房子,一直租房住。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们写散文、写小说,我想,主要是她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,所以精神上也独立,虽然没有一间具体的只属于自己的房间,但在心理层面是有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非具体指向,而是指一直被社会忽视与压制的女性找到自己的位置,使写作不再是一件需要遮掩的事。她们在两性关系中也渐渐有了话语权,可以毫无阻碍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一百年后,大部分女性地位的改变是令伍尔夫欣慰的吧。

伍尔夫说穷带给人的影响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,而且是心理意义上的,穷会让人产生自卑、胆怯、忿恨,写作自然也会带着局限。她以自己为例,她的姑姑在孟买骑马摔死了以后,每年留给她五百英镑的财产,永久有效。当年的五百英镑,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四十万左右。在此之前,她是靠给报社做临时工谋生,写些无聊的报道。迫于生计,“做着自己不想做的工作,处处说好话,看脸色,虽然没人强迫你这么做,但如果你不做,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”。想不到伍尔夫也有这样的经历,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害怕的失业吗。有了五百英镑收入后,她也就有了安全感,心中的憎恨与痛苦消失了。“我不恨任何男人,因为他们不能伤害我;我不用取悦任何男人,反正他们无法给我什么。”她开始反省自己之前完全否定某个阶级或者性别都是一件荒唐的事。她连看待事物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,从恐惧与酸楚转为怜悯与宽容,又过了一两年,连怜悯与宽容也已消失,“我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解脱,那是客观看待事物的自由”。忽然想起有个男同事,一直希望爆发战争,好像乱世中他就能分到某些富人的一杯羹似的,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中。伍尔夫阐明一份稳定的收入,能带来悠闲和满足的心灵状态,也能带来创作上广阔的新天地,可以用超越性别的目光,来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。

一百年后,虽然时代背景早已不同,但她认为物质基础决定心智自由、创作自由,鼓励女性自己去赚钱的观点,却一点也不落伍。

解读启海方言的精神密码

□黄鹤群

前不久,我惊喜地收到启东文化名人朱正球编著的《沙地乡音》一书,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。该书共收集沙地方言词条4300多条,对沙地人生活中常见的成语、俗语、谚语、俚语、歇后语及基本定型的约定俗成的基础语句,进行范读解释,还原本真。

作者拥有22年从事沙地方言播音的经历,所朗读的乡音相对规范标准。加上他退休后,先后去苏州、镇江、湖州、嘉兴等地走访;到农村户头田头、路口小店、农贸市场,广泛采风;通过大量的乡野调查,八年累积,终于抢救下了许多濒危方言的珍贵资料。这不仅具有学术价值,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。

沙地方言存在着较多的古音及有音字现象,加上人员流动,方言交叉运用及网络语言的冲击和普通话的推广,使沙地方言中的一些语句读音及用字发生了诸多变化。这就需要反复求证沙地话的使用场景和隐含的本义,原汁原味地体验沙地乡音含义。为此,朱正球先后建立了沙地话专题讨论群及正音小群反复比对考证,甚至为求证一个词语,展开上百次的专题研讨。正是这种笃行不怠、一丝不苟的精神,成就了这部鸿篇巨制。

方言是故乡打在每个人身上的胎记,是漂泊者心中永恒的印迹。沙地乡音作为沙地文化之魂,根植吴韵,兼蓄汉风,犹如一坛陈年佳酿,醇香甘甜。它说起来朗朗上口,既形象生动,又幽默风趣,承载着先民的生活智慧。《沙地乡音》词典中的每个词汇,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文化明珠,折射出沙地文化的独特光芒。

方言如血液在一个地方的血管里流淌、蔓延、融合,塑造出了这个地方的集体性格。方言在城市里流传,似乎也让一个城市

的生命力更加强大,这也是一个城市海纳百川的襟怀。这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,更是一部记录乡愁的文化史诗。它用最质朴的方式,将散落在江海平原上的方言碎片一一拾起,编织成一张温暖的文化之网,无论天涯海角,总能唤起游子心底最柔软的乡愁。

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基因密码,它蕴含着独特的生活习俗、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,是人们了解和认识一个地方的重要窗口。沙地乡音正是“沙地”的“活化石”,它保留着大量古汉语词汇,如“吓来像除龟(土鸡)”,源自《庄子·秋水》。还有如“老吃芭蕉扇”“搬嘴车舵跑”“仗嘞人排头”“阎罗王怕极腿”“江北驴子学马叫”“搬了张三吃白水”“莫名其妙土地堂”等,让我们得以窥见语言演变的轨迹,是沙地文明绵延不绝的见证。但在城市化浪潮中,这种方言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。《沙地乡音》的出版,恰似一场及时的文化抢救,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语言档案。

方言是交流的工具、文化的认同、情感的纽带,是连接游子与故乡的精神纽带。沙地乡音中蕴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心理,更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。每当人们在异地他乡听到熟悉的沙地乡音时,总能让游子热泪盈眶,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归属感。书中收录的方言词条、谚语,承载着特定区域的风土人情、文化习俗及其生活状态,展现了地域民俗文化活动的重要元素,是乡愁最生动的注脚。

沙地乡音既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,又是启海精神的凝练。本书通过对方言的研究,揭示了方言与地方戏曲、民俗、节庆等文化形式的密切关系。这些文化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独特的精神气质。特别是沙地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幽默元素,为广播电视台方言节目、方言影视、方言配音等提供用

之不竭的语言资源,可凝聚人气,凝练精神。像山歌剧《淘米记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风靡一时,还进京中南海演出,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前段时间,一曲《纺纱谣》唱响在一衣带水的崇明岛,尽显属于沙地的人文底蕴。

乡音的传承是沙地文明的使命。一个地方的方言,虽然紧紧系缚于血脉故土的脐带之上,承载着该地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地图。但在都市丛林中,人口迁徙流动如大潮奔涌,年轻一代逐渐远离方言,许多独特表达正在消失,方言乡音生存的空间正在不断挤压与萎缩,且以一种令人心痛的速度在消逝与逃遁,方言的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。《沙地乡音》不仅是一部方言研究的学术著作,也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史诗。编著者以文化自觉承担起守护方言的重任,提醒社会不能忘记守护文化的多样性。像“嘴巴凶来像铁钉,真正碰碰伊像土蚕”“塌脚背水里人没头顶”“裤子崩开,铁罐先开”等久违了的乡间俚语,仿佛让我们一下子重返孩提时代,唤起深情的记忆。

乡音聚集的城市,也被方言滋养着,成就了城市浩荡的气流、沸腾的烟火。书中对方言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深入剖析,既发出迷人的回响,也浮动着祖先丰富的灵魂、慈祥的面容。这些看似平常的方言词汇,却挖掘出蕴含其中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,得以窥见语言演变的奥秘。比如,“冬瓜藤牵嘞茹树田里”“杜米糟饭茹脚柄,越吃越得劲”“彭祖活了八百,就怕拔棉蓑种麦”“搁石头种麦,握烂泥种豆”等,这些词汇见证了沙地文化的包容与开放。

方言的未来在于创新。《沙地乡音》的出版,其实也是一种呼吁,即要在保护中发展,在传承中创新,使方言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



《中国绘画:元至清》

[美]巫鸿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以独立画家为纲的叙事方法延续了传统画史的局限,由于不把宏观历史潮流作为主要观察对象,难免会出现见木不见林之感。作者对画家的选择也多因循传统看法,习惯性地将大量篇幅给予最著名的文人画家,非文人画家和女性画家或从简,或付之阙如。



《如何阅读一棵树》

[英]特里斯坦·古利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古利在太阳、月球等天体问题上沉静、深思熟虑的权威,奠定了他的大师资格——但真正使其跻身大师行列的是他对散布在自然环境中的线索的揭示:小路上干涸的水坑、沙丘的形状、背风斜坡上的碎石颗粒,它们为何可以被用作辨明方向的指南针。



《更年期,不是忍忍就好》

[美]珍西·唐恩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作者长年耕耘于健康报道领域,四十多岁时,被一些看似随机的症状困扰:出汗、严重失眠、口干舌燥、神经紧张……在多次问诊后,她惊讶地发现一切的源头竟然是更年期。本书既是更年期亲历者问诊之路的真实记录,也是帮助读者舒适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自助指南。



《法庭上的妇女》

[美]陈美凤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对晚清民国纳妾法律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,立足581起涉及妾的法庭案件记录,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呈现了妾在社会、家庭中的百态,展演了妾这一群体在法庭上捍卫自身权益的戏剧性故事,对20世纪中国法律对妇女及其家庭的实际意义进行了生动描述。

琴弦上的神圣性

——《命若琴弦》中的意义觉醒

□高玲玲

史铁生在《命若琴弦》中,以盲人琴师的寓言,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:人生的意義是否能依附于某个具象的目标?故事中,老琴师告诉徒弟,琴槽里藏着一剂能复明的药方,但只有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取出。徒弟为此耗尽一生,却在最终发现药方只是一张白纸。荒诞的结局下,暗含的却是深邃的启示——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抵达虚构的“彼岸”,而在于弹琴过程中对意义的虔诚追寻。

这一故事启发我无尽遐思:它让我想起1980年代那封令社会为之震动的“潘晓来信”。在信中,女工黄晓菊有过这样一段对生活的思考:“为了寻找人生意义的答案,我观察着人们,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……有许多人问我何必苦思冥想,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,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很好?可我不行,人生、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,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,逼我立刻选择。”如果问如今的青年,生活是什么?恐怕再不会得到这样的思考了。大多数青年的生活,在大学前是作业与考卷,在大学里是

加权与绩点,在毕业后是成家与立业。两个时代青年思考的“生活”截然不同,令我一时难以辨明生活的真正含义。

直到我看到一位作家吐露的心声:“白天工作是为了活着,晚上写作是为了生活。”这句话带有一种简洁的震撼力,使我明白生活与活着的内在区别,“生活”将人生意义附着于“活着”,同时具备“活着”所没有的神圣性。如今许多人思考的是“活着”,不是“生活”。当青年这种“活着”与“生活”的割裂性与小说中的师徒二人何其相似。盲人琴师日复一日地弹琴,将药方视作活着的寄托,直到发觉药方只是一张虚无白纸,才终于褪去心魔触摸到生命的意义所在。史铁生通过“药方”的虚无,讽刺了工具理性对意义的消解,却也借琴弦的震颤,为困于世俗的我们指明了一条救赎之路——神圣性不在远方,而在追寻意义的姿态本身。

不可否认,如今生活的神圣性正在消失并被世俗化逐步替代。当社会对工作的期待为“活多少钱离家近”、当求职大军涌向体制直奔“宇宙的尽头是考编”时,那么,通